

编者按

《走近科学》停播了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（以下简称央视）这档曾被疯狂吐槽给中国青少年留下童年阴影的科普电视栏目，始于1998年6月1日，止于2019年9月30日。备受冷落、无人问津的“电视科普”话题因此上了热搜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议论和思考，让人有些猝不及防。对科普界而言，《走近科学》的结束的确不是一件小事。事实上，它已不是近年来第一个走到尽头的老牌科普电视栏目了。

与网友纷纷回忆栏目里那些选题和故事情节不同，科普工作者更关心的是，科普电视究竟是如何走到了这样式微的境地？还有哪些方法和途径能够让它重获生机？谁更有责任和能力成为推动科普电视发展与创新的主体？为此，《中国科学报》邀请了两位科普专家，分享他们的思考。

声音

“我们应该铭记历史、铭记为祖国发展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们，正是他们，用坚韧不拔的定力、锲而不舍的追求、为国奉献的信念，成就了中国的伟业。”

——10月12日，“致敬：中国脊梁 马刚画笔下的杰出科学家肖像艺术展”在人民日报社神州书画院开幕，画家马刚如此谈及自己的创作动机：“为表达对他们的敬意，我用画笔去创作，为科学家画像、为时代立传，让世人永远铭记！为新中国70周年70位科学家进行肖像创作，献出我的微薄之力”。

为创作科学家肖像，马刚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准备，看传记、搜新闻，谨慎选择创作对象。最终走上马刚画纸的科学家有钱学森、邓稼先、孙家栋、王希季、钱三强、朱光亚等大家，还有屠呦呦、师昌绪、南仁东等功臣。

为推陈出新、突破自我，马刚在此次展品创作手法上采用了素描、水粉、油画等多艺术手段结合的形式，小处真实、大处写意，并根据不同人物的精神、气质而采用不同手法创作，生动、艺术、传神地再现了科学家的面貌特征及精神风貌。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黄纬禄的女儿黄道群在现场观看着马刚笔下的父亲肖像，激动地说：“感觉马刚把父亲画‘活’了，看着父亲的眼睛，感觉可以和他进行心灵的对话。”

此次展览展出至10月26日。画展结束后，马刚将向这些科学家及其后人无偿捐献出自己精心创作的作品。

“含金量十足，涵盖了旧石器时代、新石器时代、夏商周及以后各历史时期，对于研究我国人类起源、文明起源、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，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推动作用。”

——《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》于10月16日正式印发。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（以下简称国保单位）共计762处，其中，古遗址167处，古墓葬30处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如是介绍第八批国保单位中古遗址的特点。

第八批国保单位包括考古遗址、建筑遗产、教育遗产、工业遗产、农业遗产、水利遗产、军事遗产、铁路文物等，覆盖面广，较好地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历程。

在40处反映新中国发展成就的国保单位中，较为突出的是一批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成就的文物，包括北京火车站大楼、佛子岭水库连拱坝等；8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文物，包括原子能“一推一器”旧址、核工业711功勋铀矿旧址，以及位于湖北、四川、贵州的6处三线建设旧址；2处反映新中国军队建设成就的文物，分别是黑龙江的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、河南的开封伞塔；3处反映新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文物，分别是北京的宋庆龄儿童科学技术馆、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和上海科学会堂；5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治理成就的文物，分别是新疆的石河子军垦旧址、玉树军垦旧址、西藏的川藏公路大渡河悬索桥、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，以及川藏、青藏公路纪念碑；1处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文物，即小岗村旧址。

在40处反映新中国发展成就的国保单位中，较为突出的是一批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成就的文物，包括北京火车站大楼、佛子岭水库连拱坝等；8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文物，包括原子能“一推一器”旧址、核工业711功勋铀矿旧址，以及位于湖北、四川、贵州的6处三线建设旧址；2处反映新中国军队建设成就的文物，分别是黑龙江的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、河南的开封伞塔；3处反映新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文物，分别是北京的宋庆龄儿童科学技术馆、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和上海科学会堂；5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治理成就的文物，分别是新疆的石河子军垦旧址、玉树军垦旧址、西藏的川藏公路大渡河悬索桥、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，以及川藏、青藏公路纪念碑；1处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文物，即小岗村旧址。

在40处反映新中国发展成就的国保单位中，较为突出的是一批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成就的文物，包括北京火车站大楼、佛子岭水库连拱坝等；8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文物，包括原子能“一推一器”旧址、核工业711功勋铀矿旧址，以及位于湖北、四川、贵州的6处三线建设旧址；2处反映新中国军队建设成就的文物，分别是黑龙江的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、河南的开封伞塔；3处反映新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文物，分别是北京的宋庆龄儿童科学技术馆、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和上海科学会堂；5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治理成就的文物，分别是新疆的石河子军垦旧址、玉树军垦旧址、西藏的川藏公路大渡河悬索桥、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，以及川藏、青藏公路纪念碑；1处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文物，即小岗村旧址。

“尽管讨论政治或社会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欣赏了丁·品达、埃斯库罗斯、歌德、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李白，但这又有什么意义？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长存。谁关心政治呢？我们关心的是那些能扩充人生的、能让我们更聪明的东西。”

——哈罗德·布鲁姆曾这样表达自己的文学观。美国时间10月14日，这位被称为“美国最臭名昭著的文学批评家”去世，享年89岁。布鲁姆1930年7月11日出生于纽约，1951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，195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。曾执教于耶鲁大学、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。自1959年发表第一本书之后，一生共出版40多部著作，包括20余本文学批评。

1973年，布鲁姆出版《影响的焦虑》，引起欧洲文学评论界的高度关注，被评论称“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”，一举奠定了他西方文坛批评大家的地位。布鲁姆品位精英，推崇莎士比亚、守卫古典审美，反对流行文学。为捍卫他所认同的文学真理，一生打过4次文仗：第一次是反对“新批评”，第二次反对解构主义，第三次是反对女权主义，第四次是反对哈利·波特文学。因为挑起一次次的论争，他也被称为“抬杠批评家”。

1994年，布鲁姆的《西方正典》收入了从但丁、莎士比亚、塞万提斯到贝克的26位西方作家，他在书中预言，文学在经历神权时代、贵族时代、民主时代之后，有一个混乱时代，然后重新开启一个神权时代。

（周天）



布鲁姆

赵致真

科普电视的出口在互联网

■本报记者胡珉琦

就在《走近科学》停播前一年多，央视更老牌更硬核的科普电视栏目《科技之光》就已经悄然消失了。而《科技之光》的创始人正是被称为中国科普电视“拓荒者”的赵致真——他曾主持制作、推出过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科普电视作品，多次获得国际科普大奖。

赵致真真是中国科普电视的先行者和倡导者，也是科普电视发展历程的一位观察者和记录者。在他看来，《走近科学》的停播既在意料之外，也在情理之中。“在倡导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今天，老牌科普电视栏目关门大吉，只是中国科普电视大环境持续恶化的一个典型的缩影。”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《走近科学》作为央视科普栏目，从1998年6月1日开播，已经有21年的历史。事实上，在央视的屏幕上，有更深厚科学背景的《科技之光》比《走近科学》栏目开播还早3年，但也已经消失近2年时间里了。你怎么看老牌科普电视栏目的相继停播？

赵致真：培植一个品牌需要几十年，而放弃它却只需要1分钟。

下个月10日，就是美国著名的儿童科学教育节目《芝麻街》诞生50周年；美国WGBH旗下的科普电视专栏《新星》1974年创建，至今也有45年历史；英国BBC最成功的科学节目《地平线》1964年开播，已经度过了55岁生日。作为一种无形资产，“老字号”品牌牵动着几代人的情感，人文价值常常不可估量。

我注意到，已经有观众在以“集邮”的精神搜罗全套《走近科学》了。今后，如果有人问起，中国的电视荧屏上，最资深、最悠久的科普节目是什么？我们白会羞愧无地、哑口无言的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中国科普电视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？

赵致真：上个世纪末，全国各地



电视台还大体都有科技栏目，记得北京台的孙永生、山西台的韩北极、重庆台的唐和平、浙江台的严义英、上海台的倪既新，都是名秀一方的科普达人。上海《科技博览》的收视率曾达到32，这是今天的电视荧屏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。

改革开放40年间过去了，我国现有电视台总数约4000家，每年生产电视剧15000集，综艺节目1000多档，但各地电视台真正的科技栏目几乎荡然无存了，更不用说一个纯粹的科教频道。

在倡导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今天，两个老牌科普电视栏目关门大吉，只是中国科普电视大环境持续恶化的一个典型缩影。

我时常想起，如果20年前办起科技电视频道，该会有多少优秀的科技节目得以问世，多少科普电视团队得以存活。

从宏观着眼，中国电视在由盛而衰的整个生命过程中，充当过“娱乐至死”的始作俑者和第一推手，又始终拒绝给观众一个科技频道，这是大节有亏的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你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科普电视还拥有多少影响力？

赵致真：如今，电视新闻仍是国民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渠道。仅从央视13套的新闻节目看，科技内容比重很大，时效性强，而且能讲述相关的知识和原理。央视的记录片频道、经济频道和综合频道也都有很好的科普节目。

我们的许多行业在国际上都从跟跑变为并跑和领跑，公众有理由对

自己的电视国家队期待更高，和BBC等世界大台一比高下。中国任何时候都不缺乏人才，就拿科普电视来说，论知识我们有李永乐老师，论制作我们有梁斌的《美丽化学》，论大片我们有陈子隽的《手术二百年》。如何做“朝无素餐，野无遗贤”，才是一切改革的要义。我们的“科普电视国家队”如果不能广开“才”路，招贤纳士，无论节目多么频繁地更名改姓，都是倒果为因、舍本逐末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多年来，你一直呼吁开办科技电视频道，现在是否具备了条件？你认为，中国电视科普发展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？

赵致真：1998年12月25日，中国科学界巨擘周光召、朱光亚、吴阶平、卢嘉锡、雷洁琼曾经联名写信给国务院，请求开办科技电视频道；1999年两会期间，多位代表提案开办科技电视频道；1999年12月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，这一呼声达到高潮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“科技电视频道”在即将临产时宣告胎死腹中。

在当下的环境中，再提科技电视频道无异于“刻舟求剑”。要想彻底解放中国科普电视的生产力，只能向互联网寻找出路。

我认为，今天制约中国电视发展的要害，在于没有一个出口和平台。不能让科普电视队伍“耕者有其田”，不能让热爱科技节目的人“饥者歌其食”。而互联网上恰恰有无限的容量和空间，只不过是需国家主流媒体的规格、名分 and 地位。

操作思路和当年并没有区别，但

主场是互联网。科普电视作品在互联网播出，甚至可比上传统电视媒体更权威、仪式感、荣誉感和成就感，更能“修正成果”。

媒体的信誉和声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芝加哥大学《天体物理学报》一向籍籍无名，著名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到来后，很快办成了世界顶级的天文学期刊。靠着中国科学界的整体优势和科普资源的相应投入，完全可以迅速把互联网上的“科技电视频道”打造成最权威的信源、最前端的窗口、最高产的良田、最完备的档案、最欢乐的舞台。

当亿万财富构建起来的互联网变成了娱乐工具、社交工具、购物工具、支付工具、交通工具时，我们只消顺势而为，就能马上把互联网变成科普工具，比另建任何其他科普设施划算百倍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互联网上的科技电视频道该由谁来“操办”，新闻媒体，还是科学部门？

赵致真：完全应该并行不悖，各展所长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科协本就是中国科普的责任部门，科技部、中科院、工程院、自然科学基金委同样肩负这个责任。美国NASA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办了3个电视频道，每天24小时向公众播出，澳大利亚皇家科学院2014年开办了自己的科技电视频道。这不仅是为了“消除公众的愚昧”，还是向纳税人述职，争取他们对科学项目的理解和支持。谁也不能剥夺科学部门对科学的话语权。

从《走近科学》停播思考如何走近科学

■王大鹏

要和《走近科学》说再见了！曾经有那么一段，因为收视率主导，它打着科学的旗号，以伪科学的手法，拍出了玄幻的效果。但正是这样一条崎岖的道路，说明了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，也凸现了科学与媒体之间的张力。虽然《走近科学》戛然而止了，但是我们对科学的普及不会停歇！

1995年5月我国颁布的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》，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。随后，电视成为科教宣传的重要手段。1998年6月1日，日播科教节目《走近科学》栏目成立，并在央视一套播出。2001年7月，《走近科学》改由央视科教频道播出。

应该说，在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和手段远不及今天这么丰富的时代，《走近科学》为公众提供了一档必要的科普大餐，是电视科普方面的一个典范。特别是作为一个科普的低端产品，填补了科普电视较少涉及乡间受众的空白。

被收视率扭曲的发展方向

2003年，《走近科学》因为收视率不佳受到黄牌警告。次年3月，节目表现形式从报道科学问题、解释科学事件，转变为关注和报道生活中的推理故事以及热点、疑点的科学解释。

虽然初心不改，但这种转变却招致了各种批评，包括“打着科学的旗号，以伪科学的手法，拍出了玄幻的效果”“用科学‘羞辱’了我们的智商”，以及“打着科学幌子的人造闹剧”等等。

视从业者之间的矛盾——科学家接受的节目类型和内容，在电视从业者看来往往对观众缺乏吸引力；而电视从业者提供的“科学产品”也往往会让科学家感到难以接受。因此，“最终出现在电视上的科学是各方通过讨价还价的结果，包括科学家、机构管理者、电视管理者和制片人、愿意承担节目费用的基金会和公司。”一言以蔽之，收视率左右了电视节目的发展方向。

经过改版之后的《走近科学》，收视率应该有所提升，但是它却让我们再也无法“走近科学”了。

出路在何方

2016年受聘为科普中国形象大使的《走近科学》栏目主持人张腾岳，在当年的全国科普日期间做客人民网，他在访谈时所表达的一些观点也许能让我们去反思科普的出路。

他认为电视的主要功能不是做科普，而是获取资讯和娱乐；当前的科普模式也需要有所跃迁，并不能单纯地拘泥于传教式的灌输；当我们把发展的中心转移到依靠科技创新的时候，科普的氛围一定会大有改观；科普也应该是泛在化的，并不能拘泥于一次活动，或者一档节目。

那么，后《走近科学》时代的中国

科普该走向何方呢？或者说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如何去反思中国科普的发展之路？

首先，科普的理论与实践都需要提升。在电视时代，科普中的传者与受者的界限非常明晰，正如美国学者马塞尔·拉夫莱特在《美国电视上的科学》一书中谈及的：“与其说电视逐渐演变成了教育的动态工具，还不如说它改善了教育方法。这种结果给电视媒介如何呈现、吸收和改变大众科学带来了影响。”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尤其是新媒体的勃兴，传与受这种二元关系受到了挑战，媒体结构也逐渐被消解。在此背景下，我们的理论与实践都需要提升，科学传播模式、公众参与科学模式，甚至是公民科学模式愈发明显，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电视等手段来开展科普不再必要了。

如今，媒介融合发展的势头正猛，一些渠道和平台也尝试着寻求突破，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作为中国的新闻舆论机构和思想文化阵地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应该承担起开展科普普及的责任与义务，这既是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普及法》的举措，也是贯彻《关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》的要求。

其次，科普的氛围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塑造。科普普及并不能单纯地依靠某一个或某几个科学家来完成，它

需要科学共同体、媒体机构、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。科学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其他领域之外，它与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因素是有机结合的。只要依靠科技创新来推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，科普普及一定会蔚然成风。

再次，科普的理论与实践需有机结合。当前的科普已不是少数明星科学家的保留战场，它是由许多全职传播者与众多热心志愿者一起组成的领域。虽然科普的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，从业者和研究人员之间交流较少，而且人们长期担忧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，但如果，科学传播研究与“接地气的”的实践无关，也难以产生有生命力的学术。

《走近科学》的停播，并不意味着利用电视这种手段开展科普的脚步会停滞，它或许会激励更多的媒体人去思考和求索，新时代背景下利用电视开展科普的方式与方法。

（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）